

中国农村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妇女 角色与地位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观察

刘筱红 赵德兴 卓惠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妇女 角色与地位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观察

刘筱红 赵德兴 卓惠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妇女角色与地位变迁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观察 / 刘筱红, 赵德兴, 卓惠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61-1997-6

I. ①改… II. ①刘…②赵…③卓… III. ①农村—妇女地位—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4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152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
插 页 2
字 数 550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编 乡村政治体系内农村妇女角色 与地位的变迁

第一章 感知的解放与感知的需求：历史背景与启悟	(47)
一 制度铁幕与制度的改变	(47)
二 被“感知”的“解放”及被“感知”所型塑的行动	(56)
三 强烈需求、优先序列与制度主导方的“感知”	(59)
第二章 跌宕：村级治理中女村民参与的文化约束与 需求收益变化（1980—1997 年）	(66)
一 “不是问题”就是问题	(70)
二 制度锁定背后的问题	(71)
（一）理治的遗产：农村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有限开放	(72)
（二）制度需求与收益：计划生育工作	(75)
（三）制度实施：行政干预的手段	(78)
三 制度收益下降背后的问题	(79)
（一）“布罗代尔钟罩”：传统礼治的社会性别安排 悄然回渗	(79)
（二）制度矩阵与激励结构：妇女回家、相对价格变化 与社会化小农	(83)
第三章 起伏：力治形式与村级治理中女村民参与的 性别价格要素（1998—2004 年）	(98)
一 上上下下的数据与起起伏伏的前行	(98)
二 农村公共权力中性别要素价格下挫	(106)

三	力量治理中的性别偏好	(111)
(一)	能力之治与能力评价的性别偏好	(111)
(二)	权力之治与权力对性别的选择	(118)
(三)	暴力之治与性别排斥	(121)
第四章	走出徘徊：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安排与 交易费用的改变（2005—2010年）	(124)
一	徘徊与走出徘徊	(126)
(一)	徘徊酝酿变化	(126)
(二)	向前，向着制度均衡走	(132)
二	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分析	(144)
(一)	制度变化改变了利益机制	(145)
(二)	初级政治市场与女性精英的治理能力需求	(151)
(三)	农村妇女的“政治产权”与国家保护、实施产权的意愿	(153)
(四)	血缘、地缘的社会性别资本	(156)
第五章	政策、政策网络、政策活动家：女村民参与 村级治理的制度推力	(160)
一	政策梳理与分析：制度安排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160)
(一)	促进农村妇女政治赋权的国际公约、会议及宣言	(160)
(二)	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部门规章	(166)
二	政策网络、政策活动家：促进制度安排的变化	(194)
(一)	政策网络的形成与行为主体的互动	(194)
(二)	政策活动家：制度安排改变的酵素	(203)
第六章	用行动来改变结构：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创新模式	(209)
一	开放的规则与开放的竞争：梨树与塘沽的尝试	(211)
(一)	竞争性直选：梨树模式	(211)
(二)	政府主导、政策创新：塘沽模式	(215)
二	便于复制的制度安排：迁西、湖南等地的探索	(224)
(一)	妇代会直选——迁西模式	(225)
(二)	省妇联与政府联合推动：湖南模式	(229)
(三)	简单就好：专职专选模式	(232)
三	激励结构的变化：合阳与广水的实验	(234)
(一)	提高女村长当选比例：合阳模式	(234)

(二) 制度组合策略：广水模式	(239)
四 廓清迷思：对创新模式的反思	(249)
(一) 路径依赖：女人职位的锁定	(250)
(二) “平等”：不是剥夺被剥夺者	(252)
(三) 善意的保护与负面的结果	(254)
(四) 关于“合法性”的思辨	(256)
五 关于创新模式改进的建议：三头并进、三足鼎立	(259)
(一) 三头并进的路线	(259)
(二) 三足鼎立的支撑	(259)

第二编 农业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农村 妇女经济角色与经济地位重构

第七章 农村经济制度创新与性别经济角色	(267)
一 非集体化：重归私域的女性劳动与农村经济的性别意蕴 ...	(268)
(一) 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	(268)
(二) 农业劳动从集体化到非集体化的转变	(271)
(三) 农业劳动的性别分工与农村妇女在劳动中的角色	(281)
二 家庭经济：男女共同经营	(283)
(一)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	(284)
(二) 家庭经营与家庭内部分工	(294)
(三) 家庭经济中妇女的经济角色与地位	(306)
(四) 农业劳动的性别分工与农村妇女在劳动中的角色	(310)
三 男工女耕：性别分工中的路径依赖	(313)
(一)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313)
(二) 性别分工中的路径依赖	(316)
第八章 新一轮制度变革与经济体系内农村妇女的再定位	(337)
一 “货币伦理”与“无酬劳动”及其对农村妇女经济 角色与地位的影响	(337)
(一) “货币伦理”与“男主外女主内”的耦合及其后果 ...	(338)
(二) “无酬劳动”：农村妇女经济贡献的被忽略及其影响	(344)
二 从“经营主体”到“制度主体”：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中	

农村妇女经济角色与地位的再问寻	(350)
(一) 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其制度革新	(350)
(二) 经营主体: 农村妇女适应制度变革的一种应然身份 ..	(357)
(三) 制度主体: 农村妇女经济角色与地位的未来图景	(363)
第九章 改进农村妇女经济角色与经济地位的制度建构	(369)
一 制度环境的优化: 妇女劳动从家户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变的国家支持	(370)
(一) 法律、政策支持	(371)
(二) 人力资本投资支持	(376)
二 制度安排的完善: 农村妇女经济合作组织的培育开发	(379)
(一) 农村妇女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效益显著	(380)
(二) 农村妇女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发展困境	(383)
(三) 农村妇女经济合作组织制度安排的完善	(385)
三 制度收益的保障: 农村妇女的非农化转移	(388)
(一) 我国农村妇女非农化转移的现状	(389)
(二) 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	(393)
(三) 推进农村妇女非农化转移的对策思考	(396)

第三编 农村性别文化中妇女的角色与地位 及平等文化系统的构建

第十章 去制度化的失败: 农村传统性别文化的复制	(405)
一 政策: 农村性别文化的改革努力	(406)
(一) 政策理念: 性别保护或中立	(407)
(二) 政策实践: 滞后或偏移	(412)
二 市场: 未触动传统性别文化的根基	(416)
(一) 农业女性化: 男工女耕分工的产物	(416)
(二) 女性边缘化: 职业性别隔离的结果	(419)
(三) 女性身体化: “他者”价值的利用	(422)
第十一章 农村妇女的文化地位和文化生活	(425)
一 规范承续中的农村妇女	(426)
(一) 《新女儿经》: 传统性别规范的延续	(426)

(二) 私人空间: 妇女地位的上下位移	(431)
(三) 公共文化场域: 妇女参与的五种形态	(435)
二 社会关系中的农村妇女	(440)
(一) 家庭: 在血缘与非血缘关系中	(440)
(二) 亲缘: 姻亲的支持	(443)
(三) 社会: 差序格局中的性别位序	(445)
三 闲暇娱乐中的农村妇女	(449)
四 习俗变迁中的农村妇女	(456)
(一) 婚居模式: 妇女生存空间的变与不变	(457)
(二) 村规民约: 妇女权益的保损书	(463)
(三) 女性禁忌: 妇女文化地位提高的羁绊	(469)
第十二章 构建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环境支持与行动系统	(472)
一 构建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环境支持	(472)
(一) 农村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	(473)
(二) 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相容	(476)
(三) 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483)
二 构建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政府行动系统	(486)
(一) 思想基础: 认识女性的特殊价值	(486)
(二) 价值目标: 性别平等	(490)
(三) 作用方式: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492)
(四) 构建性别平等文化的具体路径	(495)

导 论

对中国农村妇女而言，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是变化巨大、挑战巨大、机遇巨多的三十多年，举指数来：农村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农村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全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市场机制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农村后税费时代的来临、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完善、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结构明显变迁、农业女性化由趋势演变为格局……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宏观环境的演化，相对其他妇女群体而言，对中国农村妇女发生的影响更为深刻、更为显著。一路走来的农村妇女既沐风栉雨也沐浴灿烂阳光，经历并发生着巨变，随之也带来了许多需要研究、解答和解决的问题。新时期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社会关心、国家关注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重点观察的对象。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的重点项目成果，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项目，也反映了政界和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对“妇女社会地位”定义：妇女社会地位是不同群体妇女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与男性相比较的权利、资源、责任和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而且“妇女社会地位的发展变化，既反映了一定时期男女平等的程度，又体现了社会进程中的妇女发展状况。”妇女社会地位是标志妇女发展状况的基础和关键变量，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属性、由多项指标构成、与其他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综合性变量。本书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对农村妇女地位展开纵向历时三十多年、横向多截面的研究，力图准确地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性别结构的发展变化，反映农村妇女发展的水平，并为农村妇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咨询建议，助力于农村妇女的发展。

—

由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当下中国妇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彭珮云同志曾经说：“我国妇女工作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尤其贫困地区，没有农村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没有全国妇女的彻底解放。”说中国妇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其理由是：（1）农村妇女占中国妇女中大多数。据2009年人口统计公报，全国女性人口64882万，农村妇女大约35000万，占54%。农村妇女所占比重超出城镇8个百分点；（2）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而农村贫困人口中妇女又占了多数。根据王卓对贫困人口的研究，中国贫困人口的特征是，经济化的意愿薄弱，生育倾向较重，社会经济参与度低，社会价值标准较低和自我评价不高。所有这些特征，与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在社会化过程中被传统社会文化赋予的角色要求相吻合。由于性别歧视的文化以及劣势的积累，妇女比男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的泥淖，萨缪尔森早就观察到，在美国以妇女为主的家庭中，每5户就有2户低于贫困线。^①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详细性别统计数据，但减贫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在农村妇女是不争的事实。（3）相对其他妇女群体，中国农村妇女经历的社会变革影响大，角色和地位的变迁明显，需要给予重点的关注。农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农村的行动先于城镇。而且受市场化、城市化的影响，农村社会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扮演以及人口的转移和流动，是其他任何妇女群体所不能比拟的。由此可见，我们要如实呈现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整体图境，首当其冲要如实认知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情况，然而，又由于中国农村妇女数量大、分布广、异质性强、群体层次与结构复杂、情况千差万别，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既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研究重点的同时，又成为一个难点。

认识农业女性化格局下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认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关键。胡锦涛同志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不少地方妇女事实上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把农村妇女这支力量组织好，把她们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对

^① [美] 保·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0页。

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进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① 中国农业女性化现象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持续趋势 20 余年，一步步深化。从 1998 年国家有农民工调查数据以来，劳动力转移中的性别比例始终在男性六成多、女性三成多的水平徘徊，2009 年的统计数据与 1998 年的统计数据相比，1998 年女性农民工是 32.9%，2009 年女性农民工是 34.9%，与 11 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女性农民工的增长微乎其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 2001 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3.2 亿，其中 2.1 亿是妇女。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 82.1%，比男性高 17.4 个百分点。妇女创造的产值占农业生产总值 60% 左右。^② 具体数据见表 0—1、0—2。

表 0—1 农业从业人员性别比例

年份 农村劳动力性别构成 (%)	1990	2000	2006
男性	47.6	38.4	26.6
女性	52.4	61.6	73.4

（资料来源：谭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7 年版）

表 0—2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的性别构成

年份 外出从业劳动力性别构成 (%)	1998	1999	2006	2009
男性	67.1	66.9	64.0	65.1
女性	32.9	33.1	36.0	34.9

（数据来源：蔡方主编：《2002 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 页。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村普查领导小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① 胡锦涛：《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团结动员广大妇女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作贡献》，载全国妇联办公厅编《七大以来妇女儿童工作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 页。

②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编：《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实用手册》，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 页。

由上述数据可知,全国农村外出从业的劳动人口中,男性一直高于女性 20 多个百分点,在东北农村更是高达 40.4 个百分点。农、林、牧、渔、水利业的从业人员中,男性在逐年减少^①。中国农村农业女性化格局已形成,妇女留守农村并承担着重任,她们负担着人类半数以上的粮食生产和不计其数的无报酬劳动,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8 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妇女养活世界”,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当今中国的农村妇女当之无愧。因此,从农村从业人口的性别构成以及农村妇女在农村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农村是女人的村庄。农业女性化给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带来巨大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向来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妇女作为长期留守农村的主要居民、农业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主要构成者,是农村发展、农业发展和农民发展的主体力量。认识农村妇女,也就是认识中国农村的关键。本项目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农业女性化对于女性农民、农村、农业及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根据农业女性化的特点推动农村、农村、农民(特别是女性农民)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农村治理时,人们常常引亨廷顿说过的话来描述:“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②徐勇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指出,对于正在建构的现代国家来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如何将农民带入国家政治并置于合适的地位,是现代中国面对的重要任务。^③接着上述的话语往下说,农业女性化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农村的关键性“钟摆”作用,同样,将农村妇女带入国家政治并置于合适的地位,是党和国家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那么,当下中国农村妇女是否在“合适的地位”上呢?这也是本项目要回答的问题。

如前所述,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农村妇女发展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应,农村妇女也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有:集体经济转变为家户经济,妇女重新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

①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 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266—267 页。

③ 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新华文摘》2007 年第 3 期。

产活动中,妇女专业合作社兴起、妇女小额贷款创业、外出打工的女性往返城乡带来新的思想和创业能力、新型女农民的培养、市场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有:妇女进入村委会、妇女在公共领域更多的参与;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表现有:城市化的乡村生活建设、妇女为主体的文化组织等等方兴未艾。同时她们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产生了新的需求。如男工女耕的生产分工方式,使女性负担过重,不仅要在外承担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同时还要承担照顾家人的家务劳动,更要承受心灵的孤寂等,由此而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农村公共领域中,她们的活动空间在边缘,受到农村男性主导的主流话语所排斥。农村社会文化中一度受到批评的性别歧视文化又有所复苏,农村妇女文化生活相当匮乏。所有这些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需要新的研究予以描述并提出解决思路。

正如农业女性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一样,“三农”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学术界在研究“三农”问题、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都不太重视将妇女与“三农”结合起来考虑,“三农”问题没有找到认识的钥匙。实际上离开了性别视角,“三农”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之首是农民,而当前中国农民的主要构成是妇女,如果丢掉妇女谈“三农”,实际上就是丢掉农民谈“三农”。因此,本书致力于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三农政策之中的研究,探讨如何通过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支持,以实现农业、农村发展与农村妇女发展的良性互动,提升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充分发挥农村妇女的主体作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二

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女性化的双重背景下,处于既是农民又是妇女双重边缘状态的农村妇女受到了学术界史无前例的关注,来自各相关领域的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不仅带来充满希望的学术成果,而且极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妇女发展的进程。对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如入宝库,如数家珍,前驱者的成果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一) 国外研究现状撷英

国外有关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产出了为数不少的学术成果,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逐年推出的一套“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女性系列”，这套由12部著作组成的丛书，是西方学者以中国社会性别与妇女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精心之作，其中许多都是海外顶尖学者的著作，全面展示了海外社会性别界中国女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四部是关于或大量涉及中国农村妇女研究的著作：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其内容贯穿古今，涉及权力政治、技术经济、社会地位等内容，其中有不少独到之见，将这四部著作作为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研究的代表之作当之无愧。

性别权力与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加拿大学者朱爱岚和宝森在她们的著作中集中研究了性别权力与中国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于1986年至1990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张家车道、前儒林、槐里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其中的张家车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办工业以前一直是个农业村，土地贫乏，人均不足1.5亩，改革开放后于1986年开始开办纺织印染业，并为此被官方视为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上“共同富裕”的一个范例。前儒林土地也很匮乏，1987年就已办起若干村办企业。这两个村都有不少的外出流动人口。槐里村在农业上一直是非常成功的，大多数农户都有以户为基础的商品生产项目，村办企业虽然在集体化解体后有所增长，但增长范围有限。作者认为三个村子中以槐里最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农村，而且它的妇女组织异常活跃。以这三个村作为观察对象，朱爱岚的研究主要是在两个领域：即与权力相关的公共领域和社会组织与网络等私人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展开的，这两个领域也被作者称为全书展开论述的两条主线。她认为，虽然在家庭内部甚至在一些家庭企业内部，妇女的地位已有巨大的改善，但在村庄公共权力领域及村办企业中，男性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职位。作者认为，转型时期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复苏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国家权力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政治非强制性地静悄悄地相遇并交织在一起，并在社会性别方面发挥着权力的作用”，将妇女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由于中国农村文化的传统特点是普遍贬抑妇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经常否认她们的作用，这就在很多时候将妇女有效地排除在多数公共责任角色之外。而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转型的官方政策和话语中，妇女是几乎不被考虑进去的，也几乎没有改革项目或政策考虑过

性别利益。于是妇女在当代中国农村中的作用依然是那么隐而不见，好像她们是缺乏能力，因而同农村的政治经济是不相干的有“德行”的妇女。在社会组织与网络等私人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在农村由集体化解体向以户为经济单位转变后，社会性别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中心，妇女在每一个领域都变得不可或缺。由于男性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农业劳动中出现了明显的女性化趋势，妇女成了乡村农业甚至是乡村工业的劳动力主角、在家庭商品生产中妇女也因各种原因起了决定作用。但是男性中心主义在性别权力关系中仍表现得极为突出，比如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土地的分配以及劳动分工与安排等仍以男性为主；乡村工业方面积累的资本、重要的技术及经营岗位也基本被男性团体控制；妇女在以户为单位的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常受到男性为主的“户”的限制而受到掣肘，无法进一步拓展。通过研究，作者的结论是，妇女在改革时代农村的重要角色，与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现有地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根源又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性别的不对称的关系造成的。总之，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社区层面上，男性为中心的地位都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女性也就不可能拥有同男性相等的权力。

同样是加拿大学者的宝森在费孝通对云南禄村考察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检视了改革开放以来禄村妇女与村庄经济发展的关系，写出了《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的著作，该书正文共十章，在追溯以往六十年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从女性视角出发，挖掘并梳理缠足与纺织、农地制、农业与非农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家庭、人口变迁及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力求达到再现中国农村社会性别制度变迁的目的。例如对禄村土地占有的社会性别分析，作者不但描述了禄村不让女婿“婚入”得到土地、妇女作为个人被剥夺土地使用权等现象，而且也深刻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男性主导的权力体系。正是这种农村实际存在的社会性别政策，造成了禄村土地分配上的男女性别差异。其中第九章“政治与政治文化”中，分析了村级权力结构中的社会性别，宝森观察到禄村六十年来妇女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一般家庭妇女开始参与村庄公共会议，女代表们一起聚到村委会所在地讨论种地和计划生育的事情。但在村级权力中，男性仍占绝对优势。宝森还发现，禄村的女村干部拥有地缘和血缘资源，女干部都是嫁给同村的男人，“在当地行使政治权力的少数

妇女很像在政治上活跃的男性，她们的周围都是其亲属和自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人们”。朱爱岚和宝森的研究仔细而深入，特别注意用数据来说明事实，值得国内同行借鉴。

经济与技术活动中的中国农村妇女。朱爱岚和宝森也研究了中国农村妇女的经济生活状况，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白馥兰撰写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该书关于中国农村性别分工从汉代的“男耕女织”向元明时期的“女耕男织”转变的研究独具慧眼，可以借鉴和讨论。

白书的第二部分“妇女的工作：织出社会结构中的新图案”是整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这一部分以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史和赋役制度史发展为背景，考察了发生在家庭围墙之内的妇女纺织生产的历史变化，纺织生产在宋代以前是一个女性的专业领域。“其中，技术知识，连同生产责任都是由妇女控制、管理，而且，尽管女性生产的大部分织物是简朴的，但它们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具有被认可的很高价值：可用作赋税，纱线和绢又是有市场价值的产品”，甚至可以被当作可流通品使用。由于宋代之后纺织业的商业化、扩大化、专门化及其所导致的新的劳动分工和新的赋税制度，农村的性别分工向女耕男织转变，男人进入织业，成为织工，妇女的工作降低为不可缺少但又低级的缫丝纺纱，妇女的经济贡献逐渐边缘化，丧失了拥有重要技术领域之知识和技巧的地位。

传统的“男耕女织”格局被打破，其意义和影响不止是经济层面上的，还导致各种不同的父权制和性别观念的凸显。在这个部分里，作者提出“女工”和“妇工”概念的规范性表达以及纺织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象征性意义。“妇工”这一概念是从“男耕女织”的古义中发展出来的，通常被定义为织物的生产，是缴纳政府赋税而非追求私人收益而进行的生产，是本色又是技巧。在白氏看来，妇工除了经济上的意义外，还有政治价值和道德意义。从政治价值而言，“妇工”是作为社会秩序的部分存在的，男耕女织，男子和他的妻子同样贡献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女子与男子一样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国家再分配的经济要求维持了一个分立的女性生产部门，并凸显出女性对于家族经济以及对于履行国家义务所做贡献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妇工的妇女是承担国家赋税的积极的臣民（尽管官方认识到妇女贡献的好处，但没有证据表明官方将之转化

为对妇女劳作的一般尊重)。从道德意义而言,传统的中国性别文化中,妇工是四德之一,“妇女的纺织不仅生产有价值的物品,而且也培养德性。纺织的学习教导着基本的妇德如勤奋、节俭、有条理和自律”。因此,作者说“这些道德之线织就了中国文明”。

在白氏那里,“女工”则有不同的意蕴。它是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纺织不再是一个女性的领域,妇女的工作降低为不可少但又低级的缣丝纺纱,而她们的丈夫则负责织布并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卖,各种工作日益以工资或价格加以估价,国家赋税不再以实物而以货币计算,妇女就失去了其作为国家积极臣民的地位,妇工所具有的道德教化观念也逐步淡出,而转变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

因此,白氏在这里分析了国家试图重建传统“妇工”的努力。她指出,晚明和清代的改革派官员与道德家仍坚持抱有把“女工”转化为“妇工”的期许,他们希望将其中所蕴含的全部道德力量和心理暗示都发挥出来,以重建一个更理想的社会秩序。在这里,作者基本上认为中华帝制国家是一个道义经济体,它追求的不是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是象征性的稳定秩序。作为道义经济形态的国家,在道义经济体被破坏的时候,会像保护农业耕种一样来维持“妇工”这种秩序。白氏对“妇工”与“女工”的区别以及对国家关于“妇工”的建构与维护的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沿袭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性别分工的观点,关于“妇工”向“女工”的转变既被研究晚期帝制中国的经济史家所忽视,也被研究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者所忽视。

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研究。澳大利亚学者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一书,杰华用数年时间来调研北京(包括部分杭州的调研)的打工妹,旨在研究和理解农村女性在北京的流动和生活体验。该书的材料来自两个主要方面,一是2002—2004年参与北京“打工妹之家”的活动,对打工妹之家的成员进行了访谈和研究,二是在相同时间段里调查了北京海淀区民工聚居地的女性农民工的生活。还有从1989年对北京的10个保姆的访谈,1995年对杭州的40个打工妹的访谈,以及在报刊上收集到相关文章及资料。杰华通过这一系列的调研,试图理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对打工妹所产生的物质和情感上的影响。并试图评价向城市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和在社会中的位置。她还考察了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生活轨